



李显坤

露天电影在人们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平淡岁月中，无疑是一道迷人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在我儿时生活的石油城，露天电影堪称精神的盛宴。

我至今都觉得惊讶，在通讯基本靠口传之时，消息却总能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提前两三天，就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某一个单位要在某一天某一处放映露天电影了。

临时放映的露天电影大多是敞开让人们去看的，也有的单位是建有专门场所定期售票放映的。一般单位售票的场子，是会对本单位职工发票的，这就有了朋友和熟人间的转赠，一般无此关系和条件的，只得自己购票。这般对号入座的，看电影的人去得就从容一些。简陋的场子得自己搬凳子，还必须得早些去才能占个好位置。有条凳未编号的，有时家里人或朋友去得晚，先去的那位，就会坐在凳子上跨开腿多占几个位子，依然不够的话，便会用伸直了的上衣和捡来的砖块占位子。

有露天电影的那天，家中的晚饭总会提早些。尤其对孩子们而言，越临近放电影之时，心情越激动。但新疆夏天的太阳迟迟不下山，早早出了门的孩子们，便总是先扎堆在电影院附近玩儿上一阵子。别看玩儿得忘乎所以，心里却并不踏实，一旦玩儿过了头，好位置便会被别人抢了去。

有一回放映《红灯记》，我们几个孩子去晚了，中间位置挤不进去了，只能扎到外围的人堆里，却又看不到，便拐到了幕布的后面。幕布离山墙很近，我们便紧靠着墙根坐着，仰头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着的，这便罢了，鬼子兵出来时，我们总觉得那霍霍作响的大军靴要踢上我们的头了。

电影对大人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设置临时场地时，只要能干点儿什么，都会自觉自愿上前。立拴幕布的木桩、绑幕布等这些零星活儿，也不愁没人干。抢上活儿的，就像自己得到了美差似的，边唱边干，插不上手的人，就乐呵呵地看着人家干。

在部队时，有一次放映露天电影，打小会爬杆的我，腰里拴了根绳子，噌噌几下就爬到了杆顶，上下协力，很快就拉好了幕布。

那时，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奇袭》《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样板戏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新片太多了，优秀影片《小花》《少林寺》《庐山恋》《牧马人》等都看了很多遍，还会津津有味地再看，中途根本无人退场。

现在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常常怀念那时的老电影好看。直言通过影片质量看出了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态度，会赞叹竟然能够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导演、编剧、演员通过真正地深入生活，以及自然朴实的表演，精益求精地创作出了一部部经典。

电影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不少电影制片厂。看电影的片头，除特别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之外，几乎不离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及北京、上海、长春、西安、珠江、峨眉、潇湘等电影制片厂。每次放映正片前，一般先放《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片头曲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的开始曲一样，既让我们耳熟能详，又同样对其后的内容充满期待。之后放映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红色题材、战斗题材，还有戏曲题材，个别的也有情感题材。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特别是经典台词我依然记忆犹新。发小们相聚时，触景生情，总会很自然、很应景地脱口而出“高，实在是高”“阿米尔，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见兔子不撒张”这类句子，说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脸上总会挂着谐谑的怪相。

有些电影的情节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人生。《闪闪的红星》中，机智勇敢的潘冬子一夜之间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都日思夜想拥有一颗红星。18岁那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佩戴过的红色五星帽徽和领章，至今依然珍爱地保存着。

电影《少林寺》中李连杰干净利落的动作，

翻转打斗间透出的英武之气，几乎令所有青少年热血沸腾。保护少林寺，与坏人打斗的经典场景，总会令我们身临其境，情急处，恨不得自己也腾空而起助以一臂之力，裸露于外的胳膊腿、脑门儿被蚊虫叮咬了几个大包都毫无知觉。

看露天电影，自己带板凳去的除外。那些有长条凳而无编号的场子里，时常会有人为位子起争执。通常情况下，性情温柔的女孩子在同伴的劝下，吵几句也就风平浪静了。而男孩子，尤其是顽劣的，那点儿冲动会在同伴的起哄下，迅速演绎成拳脚相加，电影院一会儿便混乱不堪了。电影不得不中断放映时，观众的懊恼便会引发一声声低沉的叹息。

有一回两家孩子相互打破了头，家长也被卷入其中，甚至于在随后的几天，这种情绪还在蔓延着，似乎在接续电影的复杂情节。在炸了窝的争斗中，清醒的旁观者会主动躲开，着急忙慌让开场地。我曾经的一个小伙伴儿，就是在人群混乱时被抢走了头上的军帽。

大多数情况下，有的老师得知当天晚上有电影，就减量给同学们布置家庭作业了。我们背地里都说这样的老师真好。提早放学的我们跳跃着奔回家，催大人快点儿做晚饭。因心大好，连平时大人吩咐的不愿干的活儿，也利索地抢先干完了。

看了电影，不免有心得。第二天早上，激动之情仍要释放，课前课间，同学们就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起来。有时争论得正激烈，忽听有人急呼一声，老师来了！当然，这样的报警也不免是调皮同学的恶作剧。但当此时，似乎没有一人会冷静判断，总是挨了马蜂蜇般敏捷地跳回自己的座位，捧起本书来。来不及装模作样的，被老师抓住了少不得挨批。

有时我凭直觉，窥得了老师嘴角“猫捉老鼠”般的快意。

一年冬天放晚学回到家，才得知近处的部队要放电影，我激动地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待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场传来喧哗人声，还放起了音乐，便急忙

赶了去。电影散场回家，瞅着未完成的作业，不免后怕。不意身体有了感冒迹象，难受而困乏，便决定明早写。可第二天起晚了，硬着头皮来到学校，面对老师的询问，如实道明原委，老师竟意外地没有罚我多补做几遍，只笑着说了句，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那时外国电影毕竟少，印象中总是那么几部。老师给我们讲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情节时，数度声音哽咽。同学们能对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精彩片段的台词，倒背如流。有一次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我的大学》，我的一个同学调皮，垫着几块砖，把售票处上方公告小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学”字的上部擦去了前一点后一撇。结果，随后来了一位中年人，看了眼小黑板，弯腰对着售票口说：“给我买三张‘我的大学’票。”等来了结果的我们，顿时笑弯了腰。

那时我就发现，小商贩在有电影那晚，早便把摊位摆在了电影场入口处，天麻黑时还会点起一盏马灯。对孩子们而言，这就是电影放映前最诱人的一个所在。皆因摊位上的商品，大多是对小孩子极有吸引力的炒瓜子、爆米花、冰棍等，规模稍大点儿的，还会有孩子们喜爱的各色玩具。有的人家会买一些炒瓜子，一家人边吃边看电影，开心的小孩子，毫无顾忌地将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条件好的人家，在家里炒瓜子之外，还会给孩子炒上一些花生和黄豆，被幸福感“烧灼”的孩子们，边看电影边吃零嘴，那小嘴嚼出的嘎嘣脆响声，自豪地向周边张扬着自己的惬意。

当然，未必每场电影自己都觉得好看。而一旦自己不得真味的电影结束，银幕上闪出了“剧终”二字时，一种莫名的情绪便会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尽管如此，下次看电影时，仍然激情不减。

电视全面普及后，人们由此获取的信息多而广，即便国外的新闻，没多久也能知晓。而且天天都有的电视剧的内容，精彩程度很多时候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多电影，也能在电视中看到。露天电影由此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连同城市里的电影院，在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似乎也慢慢成为浅淡的一笔素描。通常若非叫得响的影片，电影院里的人数并不多。有一回散场，我张望四周后，不由笑出了声，曾经我可是被电影院、露天场里摩肩接踵的人流挤怕了。

一天晚上出门散步，听社区小广场广播声很响，寻声而往，社区在组织放映露天电影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刚过，放映的是抗日题材影片。天微凉，观众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有近二百人。前来的年轻人有看看情况的，也有停下来观看的。

我回想起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种种，那真是我朴素童年中最多彩的图画，已被时光涂抹得愈来愈浓重了。

《红楼梦》作为描写人生悲欢意蕴的大书，通过刻画人物丰富的情感，把人物写活，亦让读者体察出其命运轨迹。人们常用“音容笑貌”表示人神态整体风貌中最突出的特点，其中起指代作用的即“音”和“笑”。

雪芹描写人物顾盼言谈时也格外注重笑，使人物可观可闻、可亲可感；而他又特别爱写一系列特殊的“笑”，即“冷笑”。仅在前八十回中即有百余处。品味这些冷笑的味道，或表轻蔑，或表无奈，或表抱怨，或是对某事心知肚明而高傲不屑的轻笑，或是因对某事不愿直说而阴阳怪气的讥笑，或是因某事出乎意外而哭笑不得的苦笑。总之，这“冷”的状态繁复，并非仅仅与“热”相反。

脂砚斋批语关注到几处冷笑的妙韵。如写熙凤逞威训斥下人：“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脂评：“凡凤姐恼时，偏用‘笑’字，是章法。”这就丰富了我们对“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理解，原来这两句不是单拿着的，熙凤的威、笑之间存在紧密的伴生关系。现实生活中确有此

### 红楼微语(三)

## 黛玉的“冷笑”

魏暑临

类人，越是威怒，越是笑，笑得越冷，越是无声。

再如宝玉为大观园题“杏帘在望”，得众人喝彩，于是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脂评曰：“忘情最妙。”可见宝玉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宝玉日常与众女儿亲近总是“热”的，只在情感冷落、心中含悲时才酸辛地冷笑；在女儿面前既未能多得逞才之机，更未有过冷笑的高傲。如今在众宾客前却偏要冷笑一回，大概多少也是“重女轻男”的表现。

再如宝玉闻到黛玉袖中幽香，拉住袖口要看是何物，黛玉先是“笑道”冬天不带香，这是真笑；宝玉追问香气何来，黛玉“道”自己不知，这是中性的口吻；宝玉又说这香气奇怪，非比寻常，此时黛玉“冷笑道”：“难道我还有什么‘罗曼’‘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弟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脂评曰：“冷笑便是文章。”黛玉从笑到冷笑，颇有风致，面对宝玉的不断追问，她没有借自身奇香锁住宝玉的鼻与心，而是直率且含酸地表达内心的芥蒂，袒露出性格的真实。这种女孩儿看似惹人厌，但往往更让男孩儿醉心。

以上所举冷笑都伴随着言语，这种冷笑多侧重于神态，而非声音；我们设想当时的情境，人物说话时顶多先带出“哼”声罢了。冷笑不是真笑、喜笑，无声的神态或微声的哼唧才显得意味深长，真正大声的冷笑反而显得单一。

《红楼梦》中另有不配合言语的冷笑，如贾蔷买了雀儿哄龄官玩儿，旁人都说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去了”。这有声的冷笑，如要表演出来，该是怎样的呢？肯定是很微弱的，从鼻子里面挤出来的两声哼唧，连嘴都没张。

再如黛玉和湘云去找袭人，意外看到宝玉随便睡在床上，宝钗旁坐做针线，“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不忍嘲笑宝钗，又怕黛玉刻薄，催促快走，“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这个情节看起来很奇特，黛玉又是从笑到冷笑，她见了屋内情景，差点儿笑出声来，好像丝毫不满意，她笑也许是因抓到了宝钗现行的短儿，但能这样笑出来，可见内心真率，绝无恶意；湘云拉她走时，她明白湘云是维护宝钗，此时冷笑两声，内涵的复杂很值得品味，也许有“且记你一笔”的得意，也许有“且放你一遭”的不甘，也许有“你邀买人心又奏了效”的奚落，也许有“你这是白费劲”的自信，等等，而无论怎样，这冷笑的两声，究竟是怎样的“声”，多大的“声”？

早有人注意到这细节，如张笑侠在近百年前的《读红楼梦》中说：“此一笑冷，不知是在宝玉窗前冷笑，还是走着冷笑。如果是在宝玉窗前冷笑，还是走着冷笑。如果是在宝玉窗前冷笑，宝钗一定听得见。如今宝钗既然没有听见，当然是走着笑的，而且还是走出几步才笑的，不然仍旧是听得见。”如此分析，稍感落了下乘，因为黛玉无论在哪儿冷笑，宝钗都听不见，常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冷笑即便有声，也不会很大。雪芹所谓“两声”大概近于“两下”之意，未必真有清晰的“声”；雪芹描写此类冷笑，也并非侧重声音，而是侧重神态，近于心理。

《红楼梦》中很多人都爱冷笑，黛玉的冷笑尤有韵致。

## 负暄之乐

杨丽丽



著作了岁月的从容。

负暄之时，最宜读书。拣一本泛黄的旧书，不必是深奥的典籍，只是些山水小品或是前人的书信札记。阳光落在书页上，字里行间都浸着暖意。读到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便觉眼前有了清溪潺潺；读到李清照“赌书泼茶”的趣事，便忍不住嘴角上扬。倦了便合上书，任阳光洒在身上。这寻常日子，因了这阳光，便多了几分诗意，让人满心欢喜。

如今，我们行色匆匆，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温暖。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这般触手可及的小确幸。就像这负暄之乐，无需花费分文，只需一颗宁静的心，便能在暖阳中寻得岁月的温柔。这个冬天，不妨慢下来，寻一处向阳之地，赴一场负暄之约。让暖阳洗去一身疲惫，让岁月沉淀一份从容。你会发现，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在身边，最真切的快乐从来都源于内心的安宁。

题图摄影：佳文

是否犹豫过？他点燃一盏麻油灯，火光在洞壁上摇晃。灯芯偶尔爆出火星，他慌忙用袖口去拍——袖口里可能藏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残页，墨香混着酥油味。那一刻，纸与火仅隔一层呼吸。此后，敦煌的纸开始流浪：大英图书馆、吉美博物馆……《金刚经》书页上留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的字样，它曾在驼铃与风沙之间传递，也曾被伦敦的警报声惊醒。二战时德军轰炸伦敦，不知道敦煌卷子是否被塞进地铁隧道，与毕加索的素描、埃及的纸莎草挤在一起……

战争结束，卷子回到玻璃柜，火没有烧到它，却把它烤得更脆。如今，隔着三层防弹玻璃，经卷上“应作如是观”五个字，笔锋里藏着一把火，也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

安徽泾县，乌溪。秋分一过，漫山楂树褪去青绿，像被悄悄揭下了一层皮。皮被放进溪水里，三浸三晒，纤维像睡莲一样张开。纸坊师傅说：“纸要听水的话。”水若急，纸就松；水若缓，纸就紧。紧到极处，可千年不蛀；松到极处，可透墨如绸。

摸摸刚成形的宣纸，指尖触到一片“雾”。师傅笑：“别碰，它还不会自己‘存在’。”果然，纸在晒墙上渐渐长出骨骼，先是微颤，继而挺立，最后像一把收拢的折扇，啪的一声，把自己合进空气里。

水从云里来，经溪、经槽、经臼、经帘，把一路看过的山、饮过的雨、洗过的月光，全部压进纤维的缝隙。于是，当八大山人把一盆浓墨按在宣纸上，墨便像黑鸟扑进雾中，留下一个飞不走的翅膀；当齐白石把朱砂一点，那红便像晚照沉进水里，再也捞不起来。纸把囚禁了，水却把纸放生。

1937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在日记里贴了一张“安全区通行证”，巴掌大的纸上，盖有中日双语的印章。那张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纸，纸面有一道裂口，像被刺刀挑过。据说，有研究人员用光谱仪分析，发现纸纹里嵌着三枚指纹。指纹重叠处，纸纤维被压断，却压出一圈极细的荧光，那是泪盐与汗盐的结晶。

20世纪初，在莫高窟的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之前，

1940年，延安、八路军印刷所缺纸，人们用马兰草为原料

造纸，印出《论持久战》。那纸糙得像树皮，却能把思想种进亿人的心里。

1958年的北大荒。上海知青林绍将一封情书折成燕子，塞进农场女会计杜英的棉袄口袋里。信纸是烟盒锡纸背面，用红蓝铅笔写：“如果我冻成冰棍，请把我种进你的菜地，明年春天，我会变一畦小白菜，朝你探头。”

杜英没等到春天；林绍在修水库时滑进冰窟窿，三天后人们找到他时，他手里攥着一团湿泥，泥里裹着那张锡纸——字迹已被水泡成模糊的蓝雾。杜英把纸贴在胸口，用体温烘干，再折成一只更小的燕子，缝进贴身背心。

1979年返城时，杜英把背心脱下，放进樟木箱。2010年，她去世，女儿整理遗物，发现那只“燕子”已脆成一片“羽毛”，轻轻一碰就碎。女儿把碎屑倒进松花江，纸屑顺流而下，像一群迟到的蓝燕子，终于追上52年前的春天。

纸上有故乡，有自我的倒影。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没有纸，可能就没有可以折叠的时间；没有可以回望的记忆……

纸，把“故乡和我”书写出来，开出一朵朵的花，在记忆中明亮而又鲜艳。一张纸的承载，可以是一滴泪的重量，一个名字的温暖，一声叹息的回音。生命就像一条河，纸在，河就在；岸在，就找得到安放灵魂的地方。

# 满庭芳

第五四一二期

## 一张纸的承载

程应峰



纸的出现，比“纸”字晚得多。古人写下“纸”字的初时，蔡伦尚未出生，缣帛与竹简仍是最昂贵的记事载体。纸，让万物减去重量，化作掌心薄薄一片，却似能驮得动整个世界的叹息与光亮。

曾记得，抖开一纸发黄的家谱，纸脆得像秋蝉的翼，却倔强地撑起七代人的名字。烛火一晃，纸上的墨字仿佛活了，曾祖父的胡须，曾祖母的嫁衣、外公走四方时布鞋底的泥，都在纸纹里起伏。会呼吸的纸，把血脉的涛声压成一层极浅的褶皱，让后来人静静倾听。

纸是光的容器。北宋汴梁，上元节灯市如昼。卖糖人的老汉把剪下的“玉兔捣药”窗花递给扎双鬟的小女孩，糨糊一抹，纸就黏住了月色。同一轮月，也照在千里外歙州的一家纸坊里。做纸的师傅把湿纸从竹帘揭下，像揭下新生儿的胎膜。纸垛一层层“长”高，月光便一层层变薄，薄得可以塞进书生的行囊，随他下临安、过剑门，在漏雨的